

# 阅读开拓了我的考古视域

本报记者 刘臣君

我的“人生三书” 全民读书节特别策划⑤

**看点** 在历史的长河中,有些人以独特的方式与时间对话。从私塾教育熟读四书五经,到《幼学琼林》《三国演义》《七侠五义》及《千家诗》的启蒙,工作后对《史记》《二十四史》的深入研究,对《陶说》《中国陶瓷史》的精湛解读和触类旁通,冯永谦的“人生三书”不仅开拓了学术视野,也见证了业如何将个人兴趣与专业研究相结合,为考古学领域贡献了创新性研究成果。

接受记者采访时,已过米寿之年的冯永谦刚从阜新考察古城址归来。对于正加速消失的古迹,冯永谦希望能够及时用文字和照片加以记录、留存下来。从他1954年进入东北文物工作队算起,七十年如一日的现场调查、发掘、整理资料、学术研究,以对古代文化的深刻洞察,成就了一段令人钦佩的考古生涯。

在他家中,记者对冯永谦进行了采访。

## 背诗 感受汉字“色香味”

本报记者:您能够在小时候接受长达7年的私塾教育,可以说读遍了四书五经,为什么说印象最深刻的是《千家诗》? 这本诗

集对您有什么重要影响?

**冯永谦:**这本诗集是我童年读四书五经后的文学启蒙,也是我日后学术探索的重要基石。我认为无论是谁,若把《千家诗》《唐诗三百首》背下来,就能做到“不会作诗也会吟”。现在这些诗集脑中,成为我日后研究古代文化的坚实基础。

我曾说过:“中国的文字是带色、香、味的。”《千家诗》中的每一首诗,对我来说,都不仅仅是文字,更是一幅幅生动的画面,让我领略了汉字的魅力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对《千家诗》的理解逐渐加深。我认识到,这些诗词不仅只是文学的表达,它们背后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信息,对于我后来的考古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。我们知道,汉字是有平仄的,有平仄就有韵律,这让我们在研究古代文化时,更加注重语言的韵律和节奏。

在我的生活中,《千家诗》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我养成一个习惯,每有考古调查或发掘我都写诗,现在手机里都有随时写的诗,没保存和删掉的不少,所写也有几千首吧。这说明了用诗歌的热爱,以及诗歌在我生活中的重要性。

《千家诗》对我个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。它不仅塑造了我的文学素养,而且深化了我对古代文化的理解。我的荐读,其实不仅限于《千家诗》,包括四书五经、《幼学琼林》《三国演义》《红楼梦》,都曾经熏染过我的生活和精神,我至今仍背诵《红楼梦》里的很多诗词,对一些小说的回目仍能背诵,对这些古代经典的学习不仅能够提升我的文学素养,也使我拥有很好的古文基础,在工作后迅速进入状态。

## 读史 深刻影响考古生涯

本报记者:您推荐的第二部书是《史记》,这本书的影响在什么方面?

**冯永谦:**我的学术生涯与阅读《史记》及《二十四史》联系紧密。自1954年起,我便投身于文物考古与历史研究,至今已有70年。我的历史专著阅读之旅始于《史记》,这部司马迁撰写的历史巨著我前后用了2年时间精读,并做了大量的笔记。

到现在我还能背诵《史记》中的一些篇章,包括《游侠列传》《苏秦列传》以及关于汉武帝事迹的记载等。

继《史记》之后,我将时间投向了卷帙浩瀚的历史文献——《二十四史》。在这部包含历史的史书中,我再次投入了10年的时间精读,做笔记。我对《辽史》的研究,不只是停留在历史事件的梳理,还对史书中的记载进行了严谨的考证和修正。

在《辽史》的研究中,我特别关注辽代的《外戚表》。我发现,原有的外戚表存在诸多错误和遗漏,如行辈颠倒、信息不全等问题。为了纠正这些问题,我进行了大量资料的收集和整理。通过考古发掘的墓志等实物证据,我对辽史外戚表进行了详细的校正和补充。后来我将研究成果发表在《辽宁社会科学辑刊》上,这篇题为《辽史外戚表补正》的论文详细列出了修正后的外戚表,为理解辽代的政治结构和族群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。

## 识瓷 另辟蹊径叙述历史

本报记者:研究人类历史要从研究具体的人和具体的生活着手,您把《陶说》《中国陶瓷史》列为第三类荐读,是不是与此相关?

**冯永谦:**在我的考古生涯中,陶瓷一直是我研究的重要对象。这些看似平常的器物,实则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。它们是历史的见证,比文字更加直接地反映了古代人们的生活。因此,我对《陶说》和《中国陶瓷史》等书籍进行了深入研究,希望能从中获得对陶瓷更深刻的理解。

《陶说》为清代朱琰著,以叙述景德镇窑为重点,全书分6卷。卷一“说今篇”,叙述了清代前期景德镇窑瓷器的面貌;卷二“说古篇”,叙述瓷器起源远到种农氏时,下及唐及元代;卷三“说明篇”,记述明代历朝官窑;卷四至卷六均为“说器篇”,论述了唐虞直至明代各类瓷器。该书对研究中国陶瓷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在没有大量考古发掘之前,这是可以参考的最权威的一部中国陶瓷史,也是一部陶瓷器烧窑技术史。

陶瓷在考古学中具有重要地位,它们是判断遗迹年代的最主要证据之一。通过对陶瓷的年代、制作工艺、纹饰等的分析,就能够准确地推断出遗迹的年代和文化背景。陶瓷器是最容易损坏的器物,损坏后就随随便便丢弃。但正是这些被丢弃的陶瓷碎片,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线索。在考古发掘中,抓住这些关键的线索,能为解开历史的谜团提供重要帮助。例如,发现在辽墓中出土的瓷器,有的带有“官”字款识,这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被认为是宋代的官窑产品。但通过深入研究,我得出了不同的结论,认为这些瓷器实际上是五代时期的产品,这一发现对于理解辽代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。后来我撰写了“官”和“新官”字款瓷器之研究《辽代陶瓷的成就与特点》等论文,成为开拓性的发现。



冯永谦近照

## 冯永谦

1935年出生,辽宁沈阳人。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,从事文物考古工作70余年。被选为辽宁省考古学会名誉理事、中国长城学会理事、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、中国古钱及契丹女真史学会秘书长、中国民族史学会辽金暨契丹女真分会会长等。已发表各个历史时期的考古发掘报告与研究文章200多篇,出版学术专著20余部。本人传记被收入50多种专家学者辞典和名人录中。

除了对陶瓷的学术研究,我对陶瓷的制作工艺也有浓厚的兴趣。我曾专门到国内各地古窑址等陶瓷产地进行考察,了解陶瓷的制作过程,从选土、制胎、纹饰到烧制,这些内容不仅丰富了我的知识,也加深了我对陶瓷艺术的理解和欣赏。

我推荐的“人生三书”,其实就是我个人的学术追求,也见证了辽宁考古学的成长与变迁。每本书的阅读,都包含着辽宁考古人不解的探索和深沉的热爱,就此也造就了我的考古生涯。

## ■聊书 与心仪风物在画中相遇

画家笔下的花卉、鸟兽、草木,常常会被赋予不同的含义。宋人《宣和画谱》说:“诗人六义,多识于鸟兽、草木之名,而律历四时,亦记其荣枯语默之候。所以绘事之妙,多寓兴于此,与诗人相表里焉。”绘画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将四季荣枯、万物风华尽数流于笔端。古人常将梅、兰、竹、菊称作“四君子”,松、竹、梅称为“岁寒三友”,水仙、松枝、梅花、百合等合在一起,就是为迎接新年的岁朝图。近期出版的美术史中文新画,内容涉及中国古代书画、工艺美术、书画理论等多个方面,书籍制作也美轮美奂,在夏日清风中翻开它们,在这里可以与心仪的风物相遇。

在传统文化语境中,花鸟被赋予不同的吉祥寓意。打开《应物而祥:明清花鸟画的另类视野》一书,满目都是荔枝、朱竹、牡丹、辛夷花、墨竹、柿子、葫芦等题材的画面,蕴含着大吉大利、富贵如意等美好的寓意。作者朱万章以另类视角来解读明清花鸟画中的吉祥画,内容涉及“明代绘画语境中的文徵明朱竹”“沈周的荔枝”“陈道复的辛夷花”“吴昌硕和齐白石《葫芦图》”“鲁治《百花图》卷的画史意义”“‘岁朝图’中‘柿’的图像隐喻”等等。作者不仅探讨画作的艺术和鉴赏价值,也梳理了祥瑞题材绘画的审美与民俗等影响因素。

荔枝有“一本万利”“大利”之意,柿子代表“事事如意”,葫芦寓意“福禄”……“柿”与“事”谐音,故常常和柏枝、百合、橘或如意并列,有“百事大吉”“事事如意”之意。朱万章表示,因其所蕴含的吉祥寓意,“柿”在明清以来的“岁朝图”中时有出现,甚至充当了画龙点睛的角色。

为何在明清花鸟画中,祥瑞题材蔚为大观。作者认为,这跟明清时期的商业社会密切相关。明清时期开的商铺比宋代时期多出十倍以上,店铺开张都需要请人作画祝贺,所以明清时期祥瑞绘画大大增加。“它们既是艺术市场的宠儿,也是明清商品经济发展之下,士大夫文化与民间文化融合的缩影。”

作为西方研究中国绘画的先驱之一,喜龙仁的经典著述《中国绘画:翻译与评论》《晚期中国绘画史》以及七卷本《中国绘画:大师和原理》等,堪称中国绘画研究上的划时代巨作。尤其出版于1956年至1958年的《中国绘画:大师和原理》乃喜龙仁巅峰之作,更滋养了以李铸晋、方闻、班宗华等为代表的中国美术史领域重要学者,成为研究中国绘画必备参考书。在英文出版而世60多年后,《中国绘画:大师和原理》的中译本近日出版。

喜龙仁在《中国绘画:大师和原理》中使用了编年叙事的基本框架,喜龙仁曾五次来中国考察,因此书中得以收录了许多考古资料难以得见的绘画精品。作为20世纪欧美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引路人,也被认为是20世纪西方研究中国绘画的集大成者。

在面对所钟爱的杰作时,喜龙仁会用充满诗意的华美辞藻去描述画面上的每一个细节。比如他这样描述南宋夏珪的《溪山清远图》:“此画表现了连绵不断的山水景观,画上的不同主题如乐曲般彼此交汇贯通。画中的色调如波光潋滟有韵律地起伏:堤岸、松山、树木、茅屋、竹桥、岬角、深谷、水面、远帆都在雾气之中若隐若现。其中的主色调为黑色,暗处用深黑,明处用灰色。根据物象的不同,画上的用笔有时是短皴,有时是擦笔。这些笔墨均力道惊人,天机独运。它们用黑白二色编织出了一首极具表现力的交响乐——各种母题忽隐忽现,展现出大自然中无穷无尽的变化与运动。”

喜龙仁出生于芬兰,后获得艺术史博士学位,进入瑞典国立博物馆工作。喜龙仁酷爱旅行,他几乎每年都会花上一段时间出国旅行。一次,喜龙仁在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博物馆和弗利尔美术馆邂逅了中国绘画。中国绘画与西方艺术的差别将喜龙仁引向中国绘画研究领域。喜龙仁意识到了中国人的绘画观与西方人截然不同,他开始深入研究中国绘画的本质。喜龙仁认为中国绘画源自内在,它是由画家心底的创造力绽放而出的艺术之花。

1918年起,喜龙仁多次来华考察,对中国古代绘画、雕塑、建筑等研究颇深。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,喜龙仁陆续出版了一系列以中国艺术为主题的著作,包括《五到十四世纪的中国雕塑》《中国早期艺术史》《中国早期绘画史》《中国晚期绘画史》和《中国园林》等。喜龙仁的研究涵盖了艺术史的大部分主要门类,绘画、园林、青铜器、雕塑、建筑等。对中国艺术研究者与爱好者而言,这些著作作为他们提供了关于中国艺术的第一手资料与讯息,推动了中国艺术在西方世界的广泛传播。

# 夏日木屋旁的生命对话

贾登荣

“小屋坐落在一大片生机勃勃的平地上,在南面成片的松树和橡树中间,隐约可见一座长满青苔的小山丘,西面有一条穿过蓝莓灌木丛的秘密小路;北面则与一些公共用地陡然相接,水声潺潺。四周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,所以一切既私密,又开放。”这是瑞典女作家妮娜·波顿在所著《夏日木屋记》一书中的话。作者从在这间乡间木屋度假的经历说起,讲述自己与木屋周围小生物的邂逅,并且产生互动的奇妙经历。作者用诗意而洗练的文字,描写自然界生命的千姿百态,梳理自然界物种的进化历史,呈现各种生命体的美丽、聪颖以及它们与人类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;从而呼吁人们尊重地球上每一个生命,学会与不同物种平等对话,和睦相处。这是因为,它们“都是世界的焦点,都闪烁着自有的光芒”。

《夏日木屋记》一书作者用充满诗意画意的语言,再现小木屋外那辽阔大自然中各种生灵的多情、神奇,让人们加深对自然界生物的认知能力,增添与它们的情感共鸣。

在“蜜蜂的语言”中,作者用抒情的笔调写道:“这是一种载着花香的数学语言,是实地勘察后写成的诗歌。说它是数学语言,是因为它传递的一切都那么简洁、抽象而又精准;而说它是诗歌,是因为一切创作都离不开联想,离不开暗示深意的‘语言’。无声的交流让表达更有张力,振动也让花朵和蜜蜂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。跳上一支舞,蜜蜂就能自然完整地描述一切,从花的内部情况,到外部风速风向和大致环境,等同于绘制了一幅诗意而又精确的地图,最后准确地传达给其他同类。”阅读这些充满感情色彩的美妙文字,自然会对蜜蜂的语言产生强烈的兴趣,同时也平添了几分对蜜蜂的好感、敬重。

《夏日木屋记》一书还用大量生动有趣的事例,展现自然界各种小生物的敏锐、聪慧,唤起人们对它们深情的关注与由衷的敬意。在“鸟儿的歌喉”中,作者向我们呈现了鸟儿强烈的辨识能力。作者说:“自鸟类诞生以来,它们就受季节变化、环境和过去几代基因的影响,不仅行动较为统一,而且还会互相提供方向和保护。我曾看到数以千计的海鸥拥挤在一起,以免被猛禽夺走;与此同时,它们又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体,每只鸟都能在一万四千只鸟蛋中找到自己的宝贝;在震耳欲聋的喧闹声中,每只刚孵出的雏鸟

都能从成千上万同类中准确找到自己的父母。”

不仅鸟儿具有聪明、睿智等特质,自然界的昆虫同样如此。在“蚂蚁与信息素云”与“蚂蚁与人类”中,作者就展示了蚂蚁的多样智慧:“蚂蚁能给出指导、发出警告,能提供有关食物的信息,促进团结,能掌握周边环境情况,还会进行组织内分工。更不用说它还会撒谎,甚至会对症下药。”

大自然中的各种生命,并非孤立存在的,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正是各种生物相依相存,同频共振,才构建起这个美丽多彩、和谐共生的地球。《夏日木屋记》一书作者提醒人们,要重新认识地球上所有物种,学会尊重每一个生命,共同守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。

# 杨绛留下的亲友书札弥足珍贵

夏炜烨

**■提示**  
今年5月,在作家、外国文学研究家杨绛先生逝世八周年之际,《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》一书出版问世。该书由杨绛的遗嘱执行人吴学昭整理,已经95岁的吴学昭是教育家吴宓之女、杨绛曾经的“闺中密友”。书中所收信函呈现了钱锺书和杨绛两位先生的工作、生活、交往、论学的部分状况,见证了学人之间的珍贵友情和思想共鸣,于学术史具有珍贵的史料意义。

要了解一个作家,一要看看他的作品,还要看他的日记、信札以及他的口述。这些东西更真实,更生动,也更接近本人,都是自然的呈现。

吴宓是钱锺书、杨绛两人在清华大学就读时的老师,两家素有往来。吴宓的女儿吴学昭在退休后,常帮杨绛打理事务,两人可谓“闺中密友”。接触交流中,她们时常谈论往事,闲话家常。正是有着如此亲近信赖的关系,吴学昭曾作出版《听杨绛谈话》一书,这也是唯一一部征得杨绛首肯后传世的传记作品。

在《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》一书开篇“整理者言”中,吴学昭写道:“杨绛先生晚年最后做的一件她认为很重要的事,是亲手销毁了钱锺书先生和她本人的日记,以及某些亲友的书信。虽然我觉得很可惜,曾多次劝阻,但未能让她回心转意。”“那天在她的卧室聊天谈心,杨先生想解释一下她日前销毁日记和友人文信的理由,我没让她往下说。”吴学昭表示,“我相信杨先生自毁的日记和书信,数量也不会多。”那天见面话别之际,杨绛从橱柜里捧出一个大布袋,对吴学昭说:“这都是我看了又看,实在下不去手撕毁的亲友书信。我

近来愈感衰弱,自以来无多,已没有心力处理这些信件,现在把它们全部赠送给你,由你全权处理,相信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。写信人中,不少你都熟识,哪怕留个纪念也好……”钱锺书、杨绛夫妇保存的“不忍毁去”的这些珍贵信函承载着不容小觑的文献价值、文化含量,字里行间皆是故事、故人和温情。

《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》全书收入钱锺书、杨绛夫妇的信函277封,以及钱、杨两位先生的若干复函。这些信函始自1946年,至2014年止,多集中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。信函作者包括两位先生的至亲好友、学者同人,乃至译著者、读者逾90人。信中的一些内容不仅可补叙事,别传的损失,也为读者认识钱、杨两位先生的多种人生向度提供了真实的第一手材料。

书中所收录的老舍、冰心、柯灵、雪兰林、胡乔木、陈西禾、许觉群、李一氓、周振甫、苏渊雷、夏鼐、华君武、王岷源、黄裳、夏志清、罗新璋、李黎、黄伟经等众多重要人士的信函,不仅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材料,也是时代的记录。整理者吴学昭添加了详细的注释,介绍相关人物,交代相关事件,英法文信也逐一翻译,使读者阅读起来往往

收获信函之外的新知。

吴学昭称得上钱杨二人的灵魂之交。她读完钱杨赠予托付的全部信件后,告诉杨绛这些信件具有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,极其珍贵,自己将在有生之年将这些信件整理翻译出版,然后将原件全部捐赠国家博物馆收藏。吴学昭将这份信件的具体价值概括为三个方面,说它们“荷载着文化的信息、历史的证据和人间情义”。其时,杨绛的健康已每况愈下。在协和医院的病床前,吴学昭向杨绛道出了自己的想法,杨绛听后,极表赞成,说两人“灵犀相通”。

受人之托,忠人之事。吴学昭在“整理者言”的最后写道:“我因有约在先,直到整理、翻译、注释完《吴宓师友书札》,编著好《吴宓年谱》后,方着手整理、翻译、编辑和注释《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》,并与诸多写信人(包括已逝作者的家人)联系,获得授权同意。经过两年多的努力,总算不负杨先生所托,完成了这项工作。”

百岁老人的故事,无论其身份贵贱,都有一份沉甸甸的历史蕴含。一位文化老人的往事,往往更加璀璨绚丽。漫画家华君武与钱、杨夫妇同住北京三里河南沙沟小区多年,相互关心,时有还往。上世纪90年代初,钱先

